

## “两种生产”理论

——一个澄清

○ 江 洋

(中央编译局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北京 100032)

〔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文简称《起源》)是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写于1884年4月初至5月26日。自《起源》出版后,其中的“两种生产”理论便一直饱受争议。无论是反马克思主义阵营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都对其是否是二元论提出了质疑。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野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两种生产”理论究竟是否是二元论?“两种生产”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背弃还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两种生产”理论是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围绕这些问题,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框架中,对“两种生产”理论做出时代解读。

〔关键词〕“两种生产”;二元论;唯物史观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2.010

### 一、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起源》一书刚刚出版便遭到了反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判。自19世纪90年代起,这种批判开始集中于其中的“两种生产”理论。随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也出现了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质疑,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到20世纪50年代末逐渐转变。

#### (一)反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判

在俄国,当1894年《起源》俄文版刚刚发行,以自由主义民粹派为代表的人士就于1894—1895年间在《俄国财富》《俄国思想》《神的世界》和《民族学评论》

---

作者简介:江洋,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研究员。

等一系列杂志上发表书评,批判《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

1894年,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政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财富》第1期和第2期上发表文章《文学和生活》,批判《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他首先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sup>[1]</sup>;其次认为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sup>[2]</sup>,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为了论证经济唯物主义”<sup>[3]</sup>,在附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基础上,“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sup>[4]</sup>;最后得出结论:“在一种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40年以后,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对这一理论来说仍然是些不解之谜……而解开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找到的。”<sup>[5]</sup>

在《欧洲通报》1894年4月号上,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政论家尼·伊·卡列耶夫说:“恩格斯以新的思想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这种新的思想使得他的观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在早年他只承认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末后来,他承认家庭制度的研究亦有同等的意义,这是由关于婚姻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原始形态的新观念的影响而来的,它促使他不仅单单注意到生产物的生产过程,而同时亦要注意到人类后代的再生产的过程。”<sup>[6]</sup>

## (二)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与《起源》发表后受到反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判不同,恩格斯逝世后,对《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则更多地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两种生产”理论是否“错误”、是否“不精确”、是否是二元论提出质疑。

### 1.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亨利希·库诺最早质疑“两种生产”理论“打破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sup>[7]</sup>。他认为,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使人感到,决定社会生活的因素除了经济方式之外,还有第二个因素,即人的生育种类和方式,或更精确地说,性交的种类和方式。”<sup>[8]</sup>“这样,恩格斯就完全打破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因为仔细考察起来,这种将性交和经济方式相提并论的作法说明,社会生活中只有一部分由后者决定,而另一部分则由性生活制约。”<sup>[9]</sup>

受库诺观点的影响,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卡尔·考茨基也开始质疑“两种生产”理论。伯恩斯坦说:“就观察历史而言,要探讨的不是那自从远古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人的生命的物质性生产和再生产,而是两性共同生活的形式和它们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家族制度及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与生活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相并列而独立发生的,而是受到后者的制约的。”<sup>[10]</sup>考茨基指出:“他(恩格斯)的关于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两种生产的观点,只在这两个因素各自独立发展的时候是有根据的。如果家庭和婚姻的不断变化着的形式,也同社会中的一切其他变化一样,归根到底归因于生产力的变化,那末,他的观点就

站不住脚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归根到底仍是决定发展的唯一因素。”<sup>[11]</sup>“如果认为性交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变化,不依存于技术或经济的转化,而取决于某一其他的未知因素,那末,我们就要破坏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性。”<sup>[12]</sup>

## 2. 日本学者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经济学家、哲学家河上肇也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破坏了唯物史观的一元性,因为人类自身的生产不包括在物质生产力之中。他指出,从《起源》的序言来看,“恩格斯所谓实在的生命,和直接的生命的生产,是指维持人类的生命;所谓复生产,是指复生产人类的生命,即生殖子孙。然则左右历史的根本条件,虽然仍旧缠着‘生产’的文字;虽然表面上依然具备一元论的体裁;而其所谓生产,实际上,比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已更广义化着了。马克思史观的特征,其一元的性质已完全被破坏了。”<sup>[13]</sup>“马克思拿来作历史一元的动力之生产力是否果如恩格斯所言,包含人类生命的复生产,即是子孙的生殖,这是关于生产的意义之最后的疑问。马克思拿来作历史一元的动力,明明是物质生产力。……这个所谓物质生产中,不包含人类的生产,(即人口的繁殖)殆无疑义。”<sup>[14]</sup>

## 3. 苏联理论界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理论界几乎一致认为恩格斯的论述有“错误”,是“二元论”。

在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和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关于《起源》的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恩格斯在序言中犯了一个错误,他指出:决定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的,除了生产方式外,还有种的延续。实际上,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sup>[15]</sup>

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1947年为俄译本《起源》所写的“序言”中写道,“必须指出恩格斯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一个不精确的地方,这个不精确的地方对于各种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可以产生错误的观点”<sup>[16]</sup>，“家庭是不能与劳动、与作为社会发展底决定原因的物质生产相提并论的”<sup>[17]</sup>；在195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的编者注中说：“恩格斯在这里将种属蕃衍和生活资料生产同等当作决定社会及社会制度发展的原因来看待,是不确切的。但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本文中,恩格斯根据具体材料的分析,表明了物质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及社会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sup>[18]</sup>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苏联理论界开始出现肯定“两种生产”理论的观点,但当时的观点主要认为“两种生产”理论适用于原始社会,且“两种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不是等同的,有主次之分。

## 二、对“两种生产”理论批评者的反驳

针对反马克思主义阵营和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判,前辈

政治家、学者已给予一定程度的驳斥。

### (一)列宁等对反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判的反驳

1894年,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判,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反驳道:“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而已。”<sup>[19]</sup>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sup>[20]</sup>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sup>[21]</sup>

1895年1月,普列汉诺夫发表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驳斥卡列耶夫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攻击。普列汉诺夫反驳道:“全部问题是在是否由于所加的‘补充’,恩格斯的观点改变了;是否真的被迫得承认在生产的发展之外,还有其他‘有同等意义’的因素起作用?”<sup>[22]</sup>“我们请问,当他(恩格斯)说这一点时,是否对于自己对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的‘最初的’观点有丝毫的改变呢?他是否除了这一因素的作用,还承认某个和它有‘同等意义’的因素的作用呢?似乎是,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承认。”<sup>[23]</sup>

### (二)我国前辈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的反驳

针对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国内理论界主要从何为“一元论历史观”和辨析“两种生产”概念入手,予以驳斥。

第一,从何为“一元论历史观”入手进行反驳。

有学者指出,“所谓‘一元论历史观’,其本意只是说:对人类的历史活动,对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不能以社会意识为第一性来说明和掌握,而只能以社会存在……为第一性来说明和掌握。……‘一元论历史观’,并不是什么‘一物论历史观’;同时,通常所谓‘二元论’也者……并不是说它主张有‘二个心’或‘二个物’,而是说它主张心和物、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是形而上学地平行着的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实际上,它还是归结到唯心的一元论)。”<sup>[24]</sup>

有学者指出,“哲学上的二元论,一般意义上是指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把一世界看成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而两种生产理论并不涉及世界本原问题,也就谈不上一元论或二元论的问题。那么,两种生产理论是不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陷入了历史观上的二元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历史观上的二元论,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之前,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仅仅是就一般世界观、本体论而言,二元论也仅限于此。因为所有的哲学家,无论在本体论上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在历史观上都无一例外地陷入唯心主义,这样,也就不存在历史观上一元论二元论的划分。”<sup>[25]</sup>

第二,从辨析“两种生产”概念入手进行反驳。

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可或缺的两方面,因此“两种生产”理论是对唯物史观一元论的丰富和发展,不是二元论。<sup>[26]</sup> 另一种观点认为,“直接生活的生产”只能理解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论。<sup>[27]</sup>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指的是物的生产方式和人的生产方式,因此“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论。<sup>[28]</sup>

此外,针对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苏联理论界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原始社会特殊规律,“两种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不是等同的、有主次之分的观点,我国理论界也就此展开了热烈争论。

关于“两种生产”理论是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另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理论不是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而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关于“两种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是否等同、是否有主次之分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两种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是等同的;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两种生产”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两种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不等同,有主次之分,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是第一位的,人类自身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是第二位的;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两种生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作用的形式和重要性不同;第四种观点认为,“两种生产”中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是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 三、“两种生产”理论——一个澄清

综上所述,尽管列宁、普列汉诺夫反驳了反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判,但此后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质疑;尽管国内学者多角度论证了“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论,但在许多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这种状况表明,在“两种生产”问题上,仍有一些问题亟待探讨、澄清。例如,对“两种生产”理论是二元论的批判是否彻底? 如果“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论,那么它与唯物史观是何种关系? 是否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两种生产”理论提出后,“似乎是,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承认”<sup>[29]</sup>? 究竟何为“两种生产”? “两种生产”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如何? “两种生产”理论是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等等。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彻底批判“两种生产”理论是二元论的观点,澄清关涉“两种生产”理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一)“两种生产”理论不是二元论

综观《起源》出版后对其中“两种生产”理论的所有批评和争论,无论是米海洛夫斯基质疑的恩格斯给“经济唯物主义”加了一个非经济因素的“更正”,还是第二国际理论家质疑的“两种生产”理论“打破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抑或是日本学者河上肇质疑的“两种生产”理论破坏了唯物史观的“一元的性质”,又或者

是苏联理论界关于“两种生产”理论有错误、是“二元论”的质疑，其共同特征是，首先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其次将通过生育所进行的人的生产排除在经济之外，排除在生产力之外。那么，他们的理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相符吗？答案是否定的。

### 1.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唯物史观并非经济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到底是不是经济唯物主义？在1890年答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曾有过明确表述。当布洛赫问及“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呢，还是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坚实基础，而其他关系本身也还是发生作用的”时，恩格斯回复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sup>[30]</sup>

上述论述表明，在恩格斯看来，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说过“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而只是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sup>[31]</sup>；第二，正是在“归根到底”<sup>[32]</sup>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一定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论敌、强调被论敌所否认的主要原则的背景下，来理解他们关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sup>[33]</sup>的观点。

既然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论敌、强调被论敌所否认的主要原则的背景下，来理解他们关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sup>[34]</sup>的观点，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论敌的背景以及被他们的论敌所否认的主要原则又是什么呢？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简称《形态》）中给出了答案，即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sup>[35]</sup>，“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sup>[36]</sup>这两段论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反驳的主要论敌是唯

心史观的主张者,他们所要强调的被他们的论敌所否认的主要原则是“历史的现实基础”,即物质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sup>[37]</sup>。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论证过唯物史观就是经济唯物主义,更未承认过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他人附加在马克思恩格斯名下的错误观点。

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通过生育所进行的人的生产并非处于经济之外,并非处于生产力之外

既然“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者所借以批判“两种生产”理论的第一个论点已经站不住脚,那么他们的第二个论点能站得住脚吗?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通过生育所进行的人的生产处于经济之外,处于生产力之外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写道:“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sup>[38]</sup>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某种程度上也已明确指出,“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sup>[39]</sup>“本身就是‘生产力’”<sup>[40]</sup>。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对生产力下了明确的定义,指出“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sup>[41]</sup>。那么,“这种共同活动方式”<sup>[42]</sup>是否包括通过生育所进行的人的生产?如果包括,那么通过生育所进行的人的生产本身就是生产力。从马克思恩格斯所下生产力定义的前后语境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一定义的前后语境为,“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sup>[43]</sup>。由这段论述的第二句可以看出,“这种共同活动方式”<sup>[44]</sup>即指第二句前半句中的“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sup>[45]</sup>。而这里的“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sup>[46]</sup>又是指这段论述第一句中的“许多人的共同活动”<sup>[47]</sup>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段论述第一句中同样用“这种共同活动”<sup>[48]</sup>来指代“许多人的共同活动”<sup>[49]</sup>验证了这一点。既然“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sup>[50]</sup>中的“这种共同活动”<sup>[51]</sup>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sup>[52]</sup>,那么可以说“许多人的共同活动”<sup>[53]</sup>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sup>[54]</sup>。由于“许多人的共同活动”是社会关系的含义,而社会关系是“生命的生产”的双重表现之一,因此可以说,“生命的生产”的表现之一便是“许多人的共同活动”。鉴于“许多人的共同活动”<sup>[55]</sup>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sup>[56]</sup>,因此“生命的生产”<sup>[57]</sup>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sup>[58]</sup>。既然“生命的生产”<sup>[59]</sup>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sup>[60]</sup>,那么“生命的生

产”<sup>[61]</sup>是否包括通过生育所进行的人的生产呢？在这段论述的第一句中，马克思恩格斯早已给出了答案，即“生命的生产”<sup>[62]</sup>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sup>[63]</sup>，另一种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sup>[64]</sup>。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所下的生产力定义的前后语境中，早已明确了一点，即“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sup>[65]</sup>“本身就是‘生产力’”<sup>[66]</sup>。

由此可见，历来批评“两种生产”理论为二元论的观点所依据的第二个论据——通过生育所进行的人的生产处于经济之外，处于生产力之外——也是附加在马克思恩格斯名下的错误观点。

## （二）“两种生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

尽管我们已批判了“两种生产”理论批判者的论据，但要彻底反驳“‘两种生产’理论是二元论，破坏了唯物史观的一元的性质”的观点，我们还需继续追问，“两种生产”理论与唯物史观到底是什么关系？“两种生产”理论是唯物史观一以贯之的思想吗？它的明晰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吗？答案是肯定的。

### 1. “两种生产”理论是唯物史观一以贯之的思想

综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出，无论在唯物史观初步系统形成时期的《形态》中，还是在唯物史观在文明社会及其之后的社会发展中得到科学验证的《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著作中，无不贯穿着“两种生产”的思想主线。

#### （1）《形态》——“两种生产”思想的初步阐述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阐述了“两种生产”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初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们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sup>[67]</sup>。那么，这里所说的通过“劳动”实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和通过“生育”实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与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出的通过劳动实现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通过种的繁衍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是一致的吗？这就要从《形态》中这段话之前的相关论述进行分析。这段话之前的相关论述如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up>[68]</sup>。“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sup>[69]</sup>。“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sup>[70]</sup>“此外，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做是三个方面，或者……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sup>[71]</sup>从这四段论述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和第二个事实指的便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第三种



关系指的便是通过种的繁衍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的表述可以看做是《起源》中“两种生产”理论的雏形。正是基于“两种生产”理论的雏形,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首次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sup>[72]</sup>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sup>[73]</sup>。

(2)《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篇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一种生产的着重论述

在唯物史观在文明社会及其之后的社会发展中得到科学验证的《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篇章中,由于马克思关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最重要的方面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因此在这些著作和篇章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两种生产”中的第一种生产,即通过劳动实现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而对通过生育实现的他人生活的生产则鲜有述及或一带而过。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分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sup>[74]</sup>相反,“马克思则把生产提到首位,指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生产是出发点和决定因素”<sup>[75]</sup>，“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sup>[76]</sup>。那么,这里的物质生产指的是什么?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第一,这里的物质生产主要指“两种生产”中的第一种,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例如,马克思写道:“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sup>[77]</sup>第二,这里的物质生产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即资本主义社会在进行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方面的特殊性。例如,马克思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sup>[78]</sup>，“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sup>[79]</sup>，“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sup>[80]</sup>

在《资本论》的最初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下文简称《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表现形式——商品生产——展开了深入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结果和目的。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交换价值为生产的直接对象的商品生产<sup>[81]</sup>,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sup>[82]</sup>，“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sup>[83]</sup>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sup>[84]</sup>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生产和占有

剩余价值,“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sup>[85]</sup>。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1857—1858年手稿》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是马克思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时,马克思也曾只言片语地提及第二种生产,即“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生产)”<sup>[86]</sup>。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sup>[87]</sup>。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认为它的主要表现是“两种生产”中的第一种生产,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便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sup>[88]</sup>又如,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总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指出第一部类供给第二部类以生产资料并满足自己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第二部类供给第一部类以生活资料并满足自己对生活资料的需要。<sup>[89]</sup>

围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sup>[90]</sup>。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sup>[91]</sup>，“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sup>[92]</sup>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sup>[93]</sup>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94]</sup>关于资本主义的灭亡,马克思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

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sup>[95]</sup>

## 2.“两种生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篇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但对于“两种生产”的定义、“两种生产”的关系以及“两种生产”究竟如何推动历史进程等，都未能做出详细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没能在《形态》中对“两种生产”理论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形态》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因此在《形态》中，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并不是详尽阐述的重点，而只是为创立唯物史观，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sup>[96]</sup>，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服务的；二是受当时历史科学的局限，“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sup>[97]</sup>，人们对于原始社会的认识还只是初步的，很大程度上带有推测的性质，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也还处于初创阶段，某种程度上还处于假说状态，还未经对某个具体社会形态的研究得到部分验证，因此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很难对“两种生产”的定义、关系以及“两种生产”如何推动历史发展等问题做出更详尽的说明。

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篇章中，马克思的主要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主要表现为商品生产强加于整个社会、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而这种商品生产又主要表现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因此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篇章中，马克思将第一种生产，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主要切入点，而对第二种生产，即通过种的繁衍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则略而不提或一带而过。

因此，尽管《形态》和《资本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但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有待进一步明晰，唯物史观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源》则完成了这一任务。

《资本论》完成后，唯物史观在文明社会及其之后的部分得到了科学验证，因此系统验证唯物史观，使其在史前史中也成为科学，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主要任务。随着 19 世纪中叶后尤其是 70 年代后原始社会研究的新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加大了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态的研究力度，马克思在《古代社会》的基础上撰写了《〈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并“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史前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sup>[98]</sup>。但是死亡阻止了马克思的步伐。当恩格斯发现马克思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并了解马克思的遗愿后，便致力于完成马克思的未竟事业，试图用唯物史观阐释人类早期发展史，使唯物史观在史前社会部分得到科学验证。在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基础上，在自身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长期积淀的基础上，恩格斯意识到，进一步明晰“两种生产”理论，有助于使唯物史观在史前社会也得到科学验证，进而进一步丰富、完善

唯物史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恩格斯在《起源》中进一步明晰了“两种生产”的定义、关系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方式,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

### (1)《起源》——“两种生产”定义的明晰

在《起源》中,恩格斯首次明确阐述“两种生产”的准确定义,即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sup>[99]</sup>需要指出的是,“人自身的生产”在这里是特指通过“种的繁衍”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而不是像国内众多学术论文、学位论文所理解的那样,既包括通过“自己生活的生产”所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又包括通过“种的繁衍”所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从恩格斯为“人自身的生产”所加的众多修饰语和说明语中可以看出。例如,无论是恩格斯对“人自身的生产”所做的直接说明,即“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sup>[100]</sup>,还是对其所做的间接说明,如与“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相对应的位置上分别是“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等,都表明恩格斯这里所指的“人自身的生产”是特指在家庭范围内通过种的繁衍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

### (2)《起源》——“两种生产”的关系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方式的明晰

在《起源》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两种生产”的关系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方式。他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sup>[101]</sup>。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劳动极不发展,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极不发达,“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sup>[102]</sup>,劳动产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数量较少,从而社会的财富受到限制,因此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受人自身的生产(通过种的繁衍实现)的制约,这种制约表现在社会关系<sup>[103]</sup>层面上,就是社会制度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sup>[104]</sup>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sup>[105]</sup>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促进了“人自身的生产”关系的不断演变,社会制度相继受到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关系的支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发展,劳动产品数量的进一步增多,私有制日益发展起来,而“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sup>[106]</sup>,因此这些劳动产品大多属于丈夫所有,为了让子女将来能够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对偶制家庭让位于专偶制家庭,与此同时,阶级日益发展起来,最终炸毁了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形成了以地区团体为基础的组成国家的新社会。<sup>[107]</sup>在以私有制和阶级为基础,组成国家的新社会中,家

庭制度已经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sup>[108]</sup>,“婚姻……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sup>[109]</sup>,因此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制约,这种制约表现在社会关系层面上,就是越来越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尽管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在此处戛然而止,但从《起源》全篇来看,实际上还暗含了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充分发展,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行将消灭,“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sup>[110]</sup>中,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制约的情况,即到那时,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家庭制度不再受所有制的支配,社会制度重新表现为受“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制约,而这时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所表现出的社会关系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sup>[111]</sup>,“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sup>[112]</sup>;另一方面受人自身的生产的制约,而这时的人自身的生产所表现出的社会关系将是真正的专偶制,即不仅是对女子的专偶制,而且也是对男子的真正专偶制,这种专偶制将不再以经济因素为基础,而只以爱情为基础,“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会有别的动机了。”<sup>[113]</sup>

综上所述,“两种生产”理论非但不是二元论,而且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两种生产”理论进一步明晰了“两种生产”的定义、关系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方式;“两种生产”理论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两种生产”起作用的形式和重要性不同。

### 注释:

[1][2][3][4][5][19][20][21]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14、15、16、14、15、16、17—18、18、18、18—19页。

[6][22][23][29][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第154、155、157、157页。

[7][8][9][德]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470、468、470页。

[10]《恩格斯生平及他的理论贡献——外国学者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6年,第235页。

[11][12][德]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3、410页。

[13][14][日]河上肇:《唯物史观研究》,上海:文华书局,1930年,第38、43页。

[15][苏]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02页。

[16][17][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张仲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第170页。

[24]路耕漠:《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个经典公式的研究》,《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

- [25]商志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 [26]徐亦让:《“两种生产”原理为什么不是“二元论”》,《哲学研究》1980年第9期。
- [27]梁文达:《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观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
- [28]亦云:《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有感》,《理论探索》1984年第2期。
- [30][31][32][33][34][37]《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3,591,591,591—592,591—592,591—592页。
- [35][36][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3][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45,532,533,532—533,532—533,532—533,532—533,532,532,532,532,532—533,532—533,532,532,533,532,533,532,533,532,533,532,533,532,532,544页。
- [38]《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 [72]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上下文,笔者理解这里的“物质生产”指“两种生产”,即既包括通过劳动实现的生活资料及其工具的生产,也包括通过生育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而后文将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物质生产”,根据《导言》的相关上下文,则只能理解为第一种生产,即通过劳动实现的生活资料及其工具的生产。
- [74][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 [76][77][78][79][80][德]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6—9,11,9页。
- [81][82][83][84][85][86][112][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7,50,107,69,136,56页。
- [8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0页。
- [88][91][92][93][94][9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48,677,198,666—667,743—744,873—874页。
- [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 [9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 [96]生产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表述为“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
- [9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注释②。
- [98][99][100][101][104][105][107][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5—16,16,16,16,16,16页。
- [102][106][108][109][110][111][113][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66,77—78,84,193,198,95页。
- [103]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责任编辑:刘 璠]